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张 军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双轨制”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 90 年代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责任编辑 何元龙
施宏俊
封面装帧 宋珍妮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张 军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公司排版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插页：3 字数：255,000

印数：1—4,600

ISBN 7—208—02618—1/F·540

平装 定价：20.00 元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转轨方式的经济
学著作，它的内容从总体上反映了 90 年代以
来我在研究“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方
面所形成的一些初步的思想，也是对这几年
我在国内和国外研究与讲授中国经济改革这
一课题的阶段性的总结。作为本书的作者，我
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在理论上对传播中国经济
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作出自己微薄的贡
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证人，我和许多中
国经济学家一样，感到无比的幸运。亲身经历
并实实在在地观察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经济体
制，对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
事。也许，面对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经济学
家所受到的训练和所掌握的分析方法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可贵。在所有转轨经济中，中国无
疑是最受世人关注的一个案例。作为中国的
经济学家，我们有义务去研究我们正在经历
的历史性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转变过
程，有责任总结我们在经济改革中的经验和

教训。对这个变迁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和认识的逻辑框架,从而让我们对尚未发生或希望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更加理性的思想准备,这是经济学家的目标。当然,真正的理论工作者从来都认为,理论和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理论家可以替代在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明智的政治家和千千万万的实干家。

写作背景

我为写作本书作了充分的准备。我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在复旦大学师从宋承先教授。自80年代末以来,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制度变迁和产权理论方面的研究。1991年,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形,我的《现代产权经济学》一书在国内首次出版(到1996年3月实际上已经印行了4次)。应该说,这部著作的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是大大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它几乎成了

一本教科书而受到广泛的阅读。之后，我便着手从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思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问题。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实际上这是历史学意义上的一项大的研究工程，研究时间的跨度要足够的长，以便我们能从具体的事件中超脱出来进行理论的工作。而我当时能做的也许是运用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从一个一般的层面上来思考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和转型方式的问题，这些后来就成为我 1992 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后半部分的内容。这些内容曾陆陆续续以单独论文的形式在《经济研究》、《经济发展研究》和《上海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就在 1992 年的夏天，我尚未就修改和编辑出版博士论文作出最后的决定，就先取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BC)的慷慨资助再次来到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与上一次在英国学习不同，这次在英国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中，我接触了大量的有关前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文献和数据资料，也参与了不少讨论转型经济学

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研讨会。我渐渐放弃了原先设想的在英国继续从事运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博士后计划，决定利用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时间集中从事对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经济转轨过程的实证研究。1994 年初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国内的经济学家对“过渡经济学”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其中一个标志是，一部汇集中青年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上海举行了一个高级研讨会，包括中国海外经济学家在内的数十名青年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久，我又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的慷慨资助客座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事实上，我几乎是在研究和讲授中国转轨经济问题的紧张节奏中度过在美国的两个学期的。在美国期间，和我共事的哈勒根博士每周都和我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问题，而且我们事实上还幸运地吸引了从事东欧问题研

究的另外两位教授,他们不断地向我提供他们所发现的有关中国和东欧研究的论文与统计资料。逐渐地,一个实证研究中国转型经济问题的写作计划开始形成。由于哈勒根博士和我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快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方式的研究论文,并在我的同事的鼓励下,我开始着手整理大量的研究文献和统计数据,构思本书的写作提纲,渴望专门写一部中国经济转轨方式的经济学著作。带着大量的文献以及写作提纲,1995年6月我从美国回到上海,于秋季时节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讲授转轨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讲授的一部分内容后来以《中国过渡经济导论》为题在上海出版。尽管我在教学和社会活动(包括出国开会)等方面被占去了大量的时间,但我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转轨方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的研究和写作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我终于在1996年年底完成了本书的全部写作计划。也许和其他作者一样,完成一部著作就

像拍成一部电影，总会留下很多遗憾乃至败笔。但我十分清楚，当这部书稿终于划上一个句号的时候，这个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为本书可能出现的瑕疵和错误承担全部的责任。

鸣谢

复旦大学是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工作的地方，我很喜欢“复旦”这个富有朝气、永远年轻的名字。我在复旦大学度过了十年向壁的求学生活，正式成为复旦大学的教师也差不多有十年了。复旦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复旦的校园那样的美丽。复旦大学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有不少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教授。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学生，复旦大学给了我以知识。更重要的是，我在复旦大学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学问”和如何从事科学研究的道理，就像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

志，切问而近思”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把每一句的第二个字结合起来，那就是“学问”二字，也就是“学会问问题”。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复旦大学给了我以机会。“给青年人以机会”现在正被作为一项政策在复旦大学加以贯彻中。七八年来，我实际上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欧洲和美国度过的。东奔西走，来来去去，我始终得到复旦大学和经济学院的支持与理解。我在这里要感谢复旦大学历届的校长和始终关心我发展成长的人事（师资）部门的领导；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历任院长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我的关怀、鼓励和支持，他们是，蒋学模教授，宋承先教授，陈观烈教授，洪文达教授，张熏华教授，伍柏麟教授，洪远朋教授，尹伯成教授，吴慧贞副教授等。宋承先教授是我的导师，他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厚功底和渊博的知识，他的治学态度和人生哲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我还幸运地与许多年轻的学者愉快地共事，

我从与他们的共事与合作中获益匪浅，他们是黄亚钧博士，陆德明教授，姜波克博士，华民博士，张晖明博士，袁志刚博士，石磊博士，殷醒民博士等。

我也要感谢这些年来为我的研究工作直接和间接提供资助的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复旦大学，英国政府海外开发署，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福特基金会，亚洲基督教基金等。1996年4月我又荣幸地获得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基金的资助，并容允我拖延至1997年赴伦敦使用这笔资助。这些年来，在研究工作中，我还得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企业发展研究所，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中心，《经济研究》，上海现代经济研究所，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许多单位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我尤其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陈昕先生，他积

极支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多年来他始终如一地关心和鼓励我的研究工作。在本书于1996年底完成以后,他又积极提供出版的机会,对于他在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我表示由衷的敬意。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何元龙先生以其出色的编辑技巧为本书增色不少,他还是本书的最认真的读者之一,对于他的耐心、效率和合作精神,我表示感谢。

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长期以来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7岁的儿子哲元(又名“王子”)几乎是与我的学术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从他3岁起,他便和我一起度过了在伦敦、巴黎、西雅图和旧金山的日日夜夜。他的存在虽然消耗了我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但给了我以极大的快乐和精神的满足。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王小丽女士。毫无疑问,为了我多年的研究工作,她所作出的牺牲是我

无法说清楚的。这些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
国外，她始终与我风风雨雨，同舟共济，既分
享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快乐，更为我以及我
们的儿子付出了艰辛的代价，这本书里无疑
包含了她的心血。

张军

1997年5月2日记于上海家中

ABSTRACT

ECONOMICS OF DUAL TRACK SYSTEM: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2

It is well accepted that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market reforms have varied considerably among formerl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Following the onset of the Chinese market reforms initiated in 1978, industrial output rose fairly dramatically. In contrast, the market reforms which were initiated throughout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late 1980s were followed by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output. For some observer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 puzzling. The post — reform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ial output has occurr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reforms depart from traditional prescriptions. Specifically, the early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ackage relied neither on privatization nor on rapid reduction in the role of central planning. Until the 1990s industrial output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was insignificant and, during the early reform period, the state sector was still operating under a regime of planning where output quotas and prices continued to be administered by central

planners.

The debate concerning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n be simplified into two opposing viewpoints. On one side are those who argue that "Big Bang" market reforms will produce more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an gradual/sequenced reforms. The arguments here are based on the desirable attributes of an economy wher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re well defined, held privately, and prices are market determined. Simply put, well define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generate strong economic incentives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their highest valued uses, and market prices provide the best information on what these highest valued uses are. While there exist well accepted arguments abou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market system will fail to perform well, it is argued that the likelihood that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ll operate to improve on market results is low due to the rent seeking activities of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Proponents of "Big Bang" market reforms are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puzzle; why have the gradualist Chinese reforms generat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Big Bang" reforms of some of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resulted in output declines? The response is that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had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For example, it is argued that production was centralized in the Soviet Union to a much greater degree than it was in pre 1978 China. The relative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is not proof of the superiority of a gradualist reform package, rather, it is only indicative of a starting position more favorable for economic growth.

Proponents of the gradual/sequenced approach to reform argue that the rapid introdu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markets will not, in general, generate results that mimic the desirable aspects of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 An obvious case is that "Big Bang" reform of state industry will not immediately generate a competitive market if, after reform, the market is characterized by monopolistic practices. While